



# 金沙水拍历史回响

人民日报记者 张帆 徐元锋 李茂颖

从青藏高原一路奔流南下的金沙江水，势不可挡地冲破崇山峻岭，激荡两岸云崖，流淌在云岭高原。云南，是两支主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在云南各族人民帮助下巧渡金沙江，红军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赢得了北上的战略主动权。

84年后，站在皎平渡口，江水拍岸，翻起无数浪花。皎平渡口，在红军长征路过云南的历史中，书写下最浓墨重彩的一笔。1935年春，就是在这个渡口，3万多名红军在37名老船工的帮助下，依靠6条木船，历时7天7夜，巧渡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

在不久的将来，皎平渡口下游的乌东德大型水电站将完成蓄水，见证这段传奇历史的皎平渡口会沉入水底，附近居民也会搬到政府规划建设的安置点。

只有金沙江依旧雄浑，历经百折，日夜不绝，如同长征的历史回响，铿锵有力，绵延至今。

## 红军血染的征途，在云南奏出一曲激昂磅礴的乐章

云岭大地上，曾留下红军几千公里的征程。“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关于这段征程，毛泽东在《七律·长征》中这样写道。红军血染的征途，在云南奏出一曲激昂磅礴的乐章。这一曲乐章的第一个重要音符，便落在云南威信扎西地区。

威信县地处云贵川三省接合部，素有“鸡鸣三省”之称，是红军长征在云南境内活动时间最长的县。遵义会议后，由于土城之战失利，红军北渡长江入川计划未能实现。中革军委当机立断，西渡赤水河，进入威信县境内。

1935年2月5日至10日，中央政治局先后在威信县境内的水田寨、大河滩、扎西镇召开会议，党史界统称这三次会议为“扎西会议”，被列为红军长征35个重要事件之一。

“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拓展和完成。如果说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那么从这一个点到扎西会议连接成线，中央红军长征从此不断走向胜利。”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成信江说，作为遵义会议的延续，扎西会议解决了遵义会议已经确定但还没来得及解决的几个重要问题，还在中央红军的行动战略、部队缩编等问题上进行了重大调整。

自从红军离开中央苏区，长征沿途，既要冲破无数高山大川天然屏障的阻隔，摆脱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还要与党内错误思想展开斗争。扎西会议后，一整套机动灵活战略战术逐渐显露身手，威逼贵阳，进军云南，计划渡江北上。

中央红军二进云南。1935年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寻甸鲁口哨正式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4月30日，中央纵队进驻寻甸柯渡镇丹桂村，中革军委在这里对抢渡金沙江作出具体部署。

## 巧渡金沙江，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从禄劝县城出发前往金沙江皎平渡，沿着悬崖边蜿蜒向下，弯急坡陡。还在山顶，就隐约能见数十个直角急转的弯道，险峻地势让人触目晕眩。

沿途还能辨析出不少弃置不用的山道，随行的向导告诉记者，有些山道应当是当年红军行军走过的路。即使是驾车，也花了快两个小时才瞥见金沙江一角，难以想象红军将士当年靠着脚力，日行百里，直扑渡口。

“我师傅当年就是在这里划船渡红军过江的。”皎平村党支部书记毛洪银曾经也做过船工，他的师傅正是当年37名老船工之一。做学徒的时候，毛洪银就听老船工回忆，那时是“欺人不欺船，船桨就没有停过”。

夜色沉沉，金沙江的水面却并不平静，两岸火把大照，整整7天7夜，靠着6条小船，中央红军3万人除红九军团外，打破了“金沙不夜渡”的传统，胜利渡过金沙江天险。

在此期间，主要担负掩护中央主力红军的红九军团，则在完成牵制敌军任务后从会泽以西的树桔、盐井坪地区渡过了金沙江。

一年后，从皎平渡上溯数百公里的丽江石鼓，迎来了一路征战的红二、红六军团。在当地各族人民的帮助下，1936年4月28日，红二、红六军团于丽江石鼓的木瓜寨、格子、茨科等5个渡口，利用木船和木筏，将1.8万余名红军战士全部渡到对岸，彻底摆脱了尾追的敌人。

## 长征路上鱼水情深，红色基因代代传承

站在会泽水城扩红文化生态园群雕面前，眼前好似浮现出当年红九军团在这里扩红的盛况。

1935年5月2日，红九军团长征经过会泽，攻克县城，开仓放粮，打富济贫，发动群众，号召劳苦大众参加革命，很快掀起扩红热潮。

短短几天内，红九军团在县城扩红1500余人，筹款10万银元，骡马数百匹，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在当时，一块银元可以购买五斗大米，会泽涌动的扩红潮有力补给了长征路途的物力和财力，增强了战斗力。

沿着岸边前行，金沙江水奔腾跳跃，不断有支流注入。始终依靠人民群众，始终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法宝。

一条“红军是番民的好朋友”的宣传标语，让迪庆藏族自治州红军长征博物馆老馆长李钢印象深刻。1936年，红二、红六军团长征经过香格里拉，当时的归化寺也就是今天的松赞林寺卖给红军6万斤粮秣，在归化寺的帮助下，当地商户群众卖给红军约5万斤粮秣，为红军北上提供了充分的物资保障。

李钢说，当时香格里拉草原不过4000多人，正值“三月倒牛，四月倒马”的春荒季节，当地各界人士“勒起腰带支援红军”。

红军长征两次经过云南，为红土高原儿女带来光明和希望，进一步促进云南各族人民的政治觉醒。在长征精神鼓舞下，1935年11月，遭受破坏5年之久的中共云南地方组织恢复重建；在北上抗日的感召下，云南儿女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云南人民奋起反抗，迎来各族人民的彻底解放。

一路走来，长征所经过的云南各地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行程万里，不忘初心。

载7月25日《人民日报》



香格里拉革命烈士纪念碑

翻开历史的扉页，时光定格在1936年4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进入中甸县境（今香格里拉市），进行了19天的休整，这是红二、红六军团长征途中停留时间最长的一站，也是进入藏区的第一站。

今天，沿着革命前辈的足迹继续前行，民族团结的红色基因在迪庆高原渗进血液、浸入心扉，藏区百姓拥护核心，迪庆儿女一心向党。

## 藏区群众摆渡送红军

彭凤翥是金沙江边一位朴实厚道的庄稼汉，他租种了52亩瘦沙地，每年要交7石租。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彭凤翥还除了一只旧船，靠摆渡挣钱贴补生活。1936年4月25日中午，彭凤翥和儿子正说着话，听到江对面有人吼：“彭三爷，红军请你划船。”话音刚落，又有一个人跟着喊：“彭老板，我们是红军，帮我们摆一下渡，开给你工钱。”彭凤翥一看，江边站满了人。

刚到岸边，一名红军立刻奔到彭凤翥身边，紧握手说：“我们都是穷兄弟，是一根苦藤上的苦瓜。不要怕，我们红军是来救你们的，这次只是路过，以后打回来，才

算大解放、真解放。”较早之前，彭凤翥就听说过有关“红军救穷人，过云南”的故事，如今看到眼前的红军，他激动万分。

“每只船能载50人，船到江对面，就有50人已经排好队等待上船。”彭凤翥和其他船工夜以继日地将红军一趟趟运送过江。临别前，贺炳炎师长前来感谢他们，他说：“国民党在追击我们，土豪劣绅也会找借口欺负你们，你们看怎么办比较好？”彭凤翥和其他人商量后坚定地告诉贺炳炎师长：“把所有的船都毁了，这样国民党过不了江，只能干瞪眼。”

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1.8万多人，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率领下，从丽江石鼓至巨甸金沙江沿岸7个渡口，用7只木船和几十只木筏，四天三夜抢渡金沙江至中甸一侧，摆脱了10余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 民族团结之花盛开高原

红二、红六军团渡过金沙江进入中甸境内，在吾竹、土旺、格兰一带短期休整时，积极宣传发动群众，筹集粮食，调查研究，寻访熟知藏区情况的向导和翻译，并对部队

进行民族宗教政策的教育。

1936年5月2日至3日，在贺龙、任弼时的主持下，红二军团在中甸县城独克宗细康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即中甸会议。会议提出了六项内容，其中第三项指出，要研究在藏族地区工作的政策和策略；第四项强调，摸索藏区群众工作的初步经验。中甸会议还总结并规定了严禁进驻喇嘛寺等七条政治纪律。

中甸会议召开的第一天，贺龙率领40多名红军将士来到松赞林寺，向松赞林寺和藏族同胞表示感谢的同时，说明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贺龙说：“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宗旨就是要解放全中国，使各族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松赞林寺当即表示支持红军北上抗日。会后，贺龙向松赞林寺赠送“兴盛番族”的锦旗，祝福藏族人民繁荣昌盛。同日，红军在松赞林寺张贴布告：本军以扶助番民，解除番民痛苦，兴番灭蒋，为番民谋利益为目的，将取道稻城，理化进入川康。军行所至，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各其安居乐业，毋得惊慌逃散。尤其各尽其力，与本军代买粮草，本军当一律以现金按价照付，决不强制。

5月5日，红六军团进驻县城

## 夏那古瓦见红军

古瓦进城，正式拜访贺龙，并邀请红军首长莅临松赞林寺。

夏那古瓦不但积极宣传红军的民族政策，还帮助红军牵线搭桥，贺龙非常感动，为方便夏那古瓦开展工作，郑重授予他一张委任状：委任夏那古瓦为城乡附近乡区安抚居民和帮红军采办给养。夏那古瓦抽空回到家，一家人高兴得不得了，一晚上，全家都在听他讲与红军相处的见闻。

云报全媒体记者 张帆 饶勇 熊强



迪庆红军长征博物馆内的壁画、藏品

## 一座特殊的红色文化馆

在香格里拉市独克宗古城里，独克宗甸寨卡红色民居文化陈列馆吸引着往来游客的目光。它由当地七旬老人赵嘉林出资50余万元打造，主要展示赵嘉林的父亲赵阿印的红色故事，以及当年红军在赵家办公用过的老物件等内容。珍贵的藏品记录了发生在中甸（今香格里拉市）的“红色往事”。

1936年4月，红二、红六军团1.8万人胜利渡过金沙江后翻越雅

哈雪山进入中甸，当地老百姓和归化寺众僧不了解情况，纷纷躲避逃离。为动员民众回家，贺龙、任弼时等红军首长召开了一次藏团、汉团、商界代表座谈会，当时作为商家代表的赵阿印参与其中。在红军的指引下，赵阿印积极为红军筹办粮草、护理伤员。

“小时候，父亲经常饱含深情地给我讲述贺龙、任弼时在迪庆的故事。父亲的经历和情感，影响了我一辈子。”赵嘉林说，因钟情红色收藏，他在2016年创办了这间红色文化陈列馆，“缅怀革命先烈，弘扬革命传统，传承革命遗志，是我创办这座红色文化馆的初衷。”

云报全媒体记者 熊强 饶勇 张帆

## > 链接



博物馆内的雕像

1936年4月末，红二、红六军团胜利进入中甸地区，受地理气候、社会制度、民族信仰、语言习俗等制约，红军面临一场新的考验。

贺龙在格鲁湾找到不仅精通汉、藏、傈僳、纳西等语言，还熟悉藏区山川地理、关隘重地、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的陆云鹤做翻译和向导，详细询问和了解藏区情况并向部队进行教育。

由于红军正确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得到藏区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许多懂得汉、藏语言的群众，积极加入翻译、向导行列。夏那古瓦、赵阿印、陶子胜、苗三元等几十位藏族群众，积极帮助、配合红军筹粮办事，短短几天，就在附近村寨买到5万多万斤粮食。红军走时，陆云鹤、苗三元、格苏、腊拖、陈友贵、刘文秀、唐重余等中甸人随红军北上，先后牺牲。同时，归化寺应贺龙的请求，派出数十骑护寺兵为红军北上开道，顺利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1986年，老红军陈靖在古稀之年重走长征路时说，红军进中甸，行程405公里，在迪庆境内19天时间，在长征路上是少有的，红军与中甸藏区人民结下了血肉不可分离的感情。

云报全媒体记者 张帆 整理